

中国服务业发展及其空间结构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服务业发展及其空间结构/邱灵,申玉铭,任旺兵著.—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4

ISBN 978-7-100-10315-2

I. ①中… II. ①邱…②申…③任… III. ①服务业—经济发展—
研究—中国 IV. ①F7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34796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中国服务业发展及其空间结构

邱 灵 申玉铭 任旺兵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978-7-100-10315-2

2013年12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定价: 元

第一章 国内外服务业地理学 研究进展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世界经济愈来愈显现出国民经济软化和制造业服务化趋势。发达国家在 20 世纪 60 年代完成了工业型经济形态向服务型经济形态的转换,一些学者纷纷用“后工业社会”(Bell,1973)、“服务社会”(Illeris and Sjøholt, 1995)、“网络社会”(Castells,1996)和“服务世界”(Bryson et al., 2004)等概念来描述这一现象;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于 80 年代开始向服务型经济形态转换,发展中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则从 90 年代开始向服务型经济形态转换(钟韵和阎小培,2005)。“经济服务化”趋势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快速波及被许多经济学家称为“全球经济服务化”(黄少军,2000)。服务业地理学作为地理学的新兴研究领域,始于西方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的 20 世纪 70 年代,它是以服务业活动的地域系统为核心内容、探索服务业空间活动规律的一门学科。从研究对象来看,服务业地理学主要研究服务业区位、服务业空间过程、服务业地域综合体等。从学科体系来看,服务业地理学是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交叉形成的学科体系,所研究对象都必须落实到一定的地表空间,深刻体现出综合性、地域性的研究特征。尽管服务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具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和完善的理论研究,由于服务业地理学学科内部出现越来越多界限分明的研究议题,服务业地理学至今并未形成一套完善的理论体系,理论探索与

2 中国服务业发展及其空间结构

实践创新成为服务业地理学突破研究难点、推动学科发展的关键。基于此,本章详尽梳理了近年来国内外服务业地理的研究成果,厘清服务业地理学的研究脉络与发展趋势,以期为未来服务业地理学研究提供参考。

第一节 服务业区位研究进展

一、服务业区位的理论研究

一直以来,区位论被认为是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区位理论是区域科学的基础,是解决空间问题的有力工具(Thisse,1968)。区位理论的研究框架经历了从古典区位论到新古典区位论,再到新经济地理学背景下的区位论。古典区位论建立了区位理论的局部均衡分析框架,把价格、供求、市场、竞争以及运输成本引入分析框架;新古典区位论的发展是对古典区位论的假定条件不断放宽,坚持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把规模报酬递增当作外生变量,建立了区位理论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使其更能在一般条件下较为准确地解释现实经济,从而更好地指导区域经济活动的过程(陈文福,2004)。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及由此引发的投资、贸易、要素流动和区域政策问题也对区位理论的研究框架提出了新的要求,区位理论的研究框架进一步发展为新经济地理学背景下的区位理论。新经济地理学基于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多样化的需求假设,引入内在的区位因素(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偶然事件、路径依赖),建立多重均衡模型,从而丰富和完善了区位论,为新形势下发展传统区位论找到了突破口(段学军等,2010)。从区位理论的发展历程来看,区位理论研究涉及面不

断延展,建构区位理论的假设条件不断放宽,并且更加重视非经济因素,引入计量方法等技术手段,从时间序列来研究地理要素随时间变化的规律,使得模型更具适用性和科学性。

伴随着西方发达国家服务业的兴起,服务业的产值和就业迅速增长,服务业区位理论逐步引起学界关注。从学科理论发展来看,服务业区位论是服务业地理学的核心内容,中心地理论一直被认为是服务业区位论的基本理论(方远平、闫小培,2008),理解服务业布局的基础(Daniels,1985)。当然,随着经济的发展及人们认识的深化,也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如 Vance 批评此理论中的系统过于封闭,实际上中心大都市更多的是依靠外部力量发展,贸易和批发业对中心地模式和布局也有着很大的影响(Stanbackt,1980)。因此,仅考虑单一的经济因素已不能反映企业区位选择的目标,重视非经济区位以及行为因素的新区位理论也就应运而生。根据国内外相关研究,与服务业区位相关的理论大致可以分为经济学理论、行为及组织结构理论、制度结构理论、空间组织理论等。典型的经济学理论如地租理论和集聚理论,前者是服务业区位选择与空间布局的基础理论,它说明了各种经济活动区位主要是决定于与中心位置的接近性这一利益的追求和对地租的支付能力;后者在服务业上则主要体现为利益指向性、劳动力指向性和信息区位指向性的三种集聚原则。组织结构与行为理论主要包含了行为理论和企业地理理论,这以普雷德的“行为矩阵”为代表。结构主义理论主要从社会学角度探讨各种社会结构对企业产生的影响,为服务业区位提供非经济学的分析工具。空间组织理论主要包括了著名的中心地理论和城市空间结构理论,此外还有效率与公平理论等(张文忠,1999;方远平、闫小培,2008)。

二、服务业区位的实证研究

国内外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较为丰富,从研究内容来看主要集中在服务业区位特征、区位选择及影响因素的探讨。①关于服务业区位特征的探讨。Wyckoff(1989)根据科罗拉多州的商业资料分析服务业的布局发现,杂货店、医院、牙科诊所布局与人口分布一致,符合中心地理论,批发业的布局对应生产性服务业的理论区位。张文忠(1999)从经济区位论的角度研究了不同类型服务业的区位特征,以及服务业布局的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发达国家大城市服务业布局的特征和空间演变趋势。②关于服务业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探讨。Björn Surborg(2006)研究了河内市先进服务业集群,通过区位分析和景观区解释,认为服务业的选址决策主要受建筑环境、区域特点以及地价的影响。此外,陈殷、李金勇(2004)对生产性服务业区位模式及影响机制进行了研究,张诚、赵奇伟(2008)探讨了中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及影响因素,李非、蒋亚杰(2011)分析了台湾生产者服务业区位分布影响因素。

从研究视角选择来看又可以分为两类。①对服务业区位的综合研究。程大中、黄雯(2005)基于LQ指数、RCA指数和K-spec指数,分析了中国服务业及其分部门的区位分布与地区专业化。陈建军、陈国亮(2009)对集聚视角下的服务业发展与区位选择进行综述。②对服务业内部分支行业的研究。Fortney(1996)从社会公平的角度分析公共服务设施区位选择,并构建了区位—分配模型,从而实现公共设施区位的最优化。Bertazzon and Zaninotto(1996)分析了意大利一些城镇新兴超市的区位选择模式。Jessica and Chandra(2007)、Aarhus(2000)分别对住宅、仓储业、酒店、办公

活动区位进行研究。国内学者刘曙华和沈玉芳(2007)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区位驱动力进行研究;叶立梅(1993)、吕晓蔚(2007)、陈祖华(2010)分别对金融服务业区位进行研究;闫小培(1996)分析了信息服务业区位选择;张景秋和陈叶龙(2011)、宁越敏(2000)分别对办公活动区位进行探讨;蔡国田等(2002)、陈忠暖 and 闫小培(2006)、张文忠和刘旺(2002)分别对零售业区位、公共服务业区位、住宅区位进行了研究。从文献梳理结果来看,国内对服务业区位的研究与国外基本保持一致,从研究的行业分布来看,相对集中于对生产性服务业,并且对金融业、信息服务业、办公活动等高级生产性服务业较为偏爱,这也与该类行业所起的作用较为突出并且发展迅猛有关。总体来看,服务业区位各领域的研究发展并不平衡,缺乏一般性规律的探讨与总结。

随着信息技术向生产和生活中的渗透,信息技术的支撑力越来越强,信息技术与社会的互动作用也改变着传统的思维范式。区位论正向区位因子软化、选择范围全球化、区位主体现实化、产业区位以信息知识产业为主以及中心地理论虚拟化的方向发展(张林、刘继生,2006)。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入,传统的服务业区位理论亟须创新,需要在传统区位论中融入个人行为、社会制度、信息技术等决策影响因素,建立新的区位选择模型,而当前对信息技术影响下的服务业区位选择探讨的较少。多年来,国内外地理学者对区位论都偏向于宏观探讨,而对区位论在局地范围内(即微区位论)的研究较少。国内学者孙鹏、王兴中(2002)对西方国家社区环境中零售业微区位论进行归纳,白光润(2004)、白光润和李仙德(2008)对商业微区位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第二节 服务业空间过程研究进展

服务业的空间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实质就是从时间的尺度来看待服务业产业空间发展,主要通过服务业的集聚、扩散、相互作用形成新的服务业空间形态或景观(吕拉昌、闫小培,2005)。对服务业空间规律的认识受到制造业空间规律的影响。因此,对服务业空间过程这一议题的研究主要包括服务业发展的空间格局、服务业集聚及扩散的机理、服务业空间相互作用。

一、服务业发展的空间格局研究

服务业空间差异是服务业空间格局的表现,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它的发展和变化对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等诸多方面都产生着直接、间接的影响。由于服务业门类广泛、部门性质差异较大以及服务业无形性、不可储存性、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等特征,使得对服务业地理的研究大多从具体行业部门出发,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是目前服务业空间格局的主要关注对象。Daniels(1985)基于区域尺度分析了欧盟服务业发展的空间差异。Illeris(1989)、Illeris and Philippe(1993)的实证研究表明,西欧、北美典型国家 20 世纪 70~80 年代大都市区服务业发展水平普遍高于其他地区,北欧各国有 70% 以上的生产性服务业集中在首都,首都和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大都市区区位商大于 1,非都市区区位商均小于 1,人口不稠密的地区区位商甚至小于 0.5。James(2009)研究发现,在过去的 30 年,专业服务已经呈现出异常迅猛的增长,功能整合的“集群”和明显

的空间集聚,空间集聚是企业学习和创新、增强竞争力的基础。CBD是高端服务业集聚之地,近年来在国外又呈现出生产服务业在大都市中由中心区向外扩展的趋势,使大都市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呈现出多中心化的发展态势(Longcore and Rases,1996;Forstall and Greene,1997;Fujii and Hartshorn,1995),但 Coffey and Shearmur (2002)通过对加拿大蒙特利尔高端服务业的研究发现,产业扩散促进了多中心城市结构的形成,优化了产业空间组织。

国内学者这方面的研究也颇为丰富。夏杰长(2007)对中国服务业的发展与财税政策选择的研究也表明,大都市区服务业发展水平普遍高于其他地区。邵晖(2008)对北京生产者服务业聚集特征分析发现,北京市的生产者服务业呈现明显的聚集特征,而向郊区扩散的趋势并不明显,并且金融业、信息咨询业、计算机服务业三类生产者服务业的聚集特征有所差别。林彰平、闫小培(2006)分析了广州市金融服务业变动格局,发现转型期广州市金融服务业向城市新区扩散和向城市中心区集聚并存,“集中于越秀”的初始空间格局变为“中心区多点集聚”的现状空间格局。胡霞(2009)对我国城市服务业空间集聚变动趋势研究表明,中国城市服务业呈现明显的产业集聚现象,其强度高于工业,并且集聚大小与行业的社会性质相关,东部和中部的集聚度在逐步减弱,而西部在提高。申玉铭等(2007)对我国服务业的空间分异特征研究发现,1990年以来中国服务业空间分异的基本格局总体稳定、略有波动;不同省(区、市)服务业内部结构存在着明显的梯度差异。

通过对以上相关文献梳理发现,服务业在区域间格局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差异性,而在城市内部表现出的空间格局特征主要为:
①中心性即服务业主要分布在城市地区尤其是大都市区;②集中的

分散性即集聚于 CBD 以及多个中心地区,形成组织分散但产业关联密切的空间格局;③专业性即服务业中的专业服务业发展迅猛,呈现出明显的集聚特征。

二、服务业集聚与扩散的机理研究

对服务业空间集聚与扩散的机理关注时间并不长,服务业集聚与扩散机理研究很大程度上受到制造业集聚与扩散机理的影响。然而,Moullaert and Gallouj(1993)认为制造业集聚的理论及模型并不适合服务业,因为服务业企业提供的是差异性最大的定制性服务,其服务的特定性、创新性和专业性有别于单纯的制造业企业。Hsieh 等(2011)发现服务集群不同于传统集群关注成本、生产和分发渠道,并更深层次的研究服务创新和网络联盟,用产业集群分析服务集群的价值创造过程,对服务集群获取和保持竞争优势提出新的见解,也为决策者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来提升区域和全球的竞争力。Scott (1988)认为现代服务业从城市中心区域向边缘区域扩散是源于新经济发展的需要及弹性生产方式的出现,而信息网络技术的兴起使得经济发展呈现出更加分散的趋势,对于需要面对面接触的“前台”功能的现代服务业应保持集聚趋势,而“后台”功能的现代服务业不需要采用面对面接触方式,可以远离大城市的中心商务区,布局在大城市边缘区域,享受较低的商务成本。Daniels(1995)指出,现代服务业中的商务服务业在大城市的集聚与在偏远地区的扩散是同时存在的。因为不同的商务服务业企业的最优选址决策是不同的,对于集聚和扩散,不可能有哪一种模式处在完全主导地位;服务的交易频率、持续时间、复杂性和相互关联等都是影响现代服务业集聚或扩散的因素。Stein(2002)认为那些不复杂的、能够实现标准化的服务业

会在空间布局上趋于分散,而那些复杂的、不能实现标准化的服务业会选择集聚的布局模式。

任英华等(2011)研究我国现代服务业集聚形成机理,发现技术差异在时间维度上对现代服务业集聚促进作用显著,在空间维度上并不显著;交易费用与现代服务业集聚有显著的负相关性;知识溢出、规模经济、政府行为对现代服务业集聚促进作用显著。林彰平、闫小培(2007)分析了东莞市金融服务业分散化空间格局和广州市金融服务业变动格局,认为社会经济体制和金融管理体制转型、金融机构行为变化以及城市空间扩张分别是金融服务业空间格局变动的前提条件、微观基础和空间张力;城市化集聚经济效应促进各区金融服务业差异化增长;依次集中兴建的城市办公活动空间吸引金融机构在城市特定地段集聚。易虹、叶嘉安(2011)分析了广州市生产服务业发展初期空间格局的形成机理,认为传统城市格局的空间重构、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和地方政府调控以及生产服务业自身空间行为差异是其空间集聚发展的内在动因。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服务业集聚和扩散机理进行探索,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国外学者的研究更多是从个性化服务的特征出发,国内学者的研究更多是将社会制度的影响纳入分析框架。服务业集聚有一般产业集聚的共性,但也有其特殊性。因此,对服务业集聚和扩散影响因素、形成机理的探究都需要结合服务业特有的性质以及社会制度的影响来分析。

三、服务业空间相互作用研究

区域经济是开放的,所以任何一个区域都会与其他区域发生经济联系,其中服务业空间作用也必不可少。服务业的空间相互作用

是指区域服务业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包括区域服务业的贸易、合作与竞争,对区域之间经济关系的建立和经济发展有很大影响。一方面能够加强区域经济联系,拓展彼此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能够引起区域之间对资源、要素、机遇的竞争。

服务业通过贸易对区域与外部的联系产生作用,进而影响到区域发展。出口基础理论认为,出口是区域经济的发展动力,出口部门能够带动其他部门的发展。Smith(1984)对威斯康星地区的研究表明,服务业在非大都市地区也可成为出口的基础部门。服务业出口的一个重要方式是出口生产性服务给其他地区的企业。消费性服务的出口对象主要是游客和旅行者。当然服务业贸易方面也存在较多障碍,为了克服这个障碍,服务业企业选择通过分支机构间接地出口或选择服务贸易合作伙伴进行贸易,旅游和商业服务业已经国际化了。发达国家一般是服务贸易的净输出国,但净输入对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曾慧琴,2009)。服务贸易出口和服务贸易进口对服务业和经济增长都具有促进作用,从长期来看,服务贸易进口对于服务业具有显著的推动效应,而服务贸易出口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更显著的推动效应。以上文献是对服务业贸易结果或影响的研究,而对区域之间如何开展服务业贸易分工以及服务业贸易可能对区域产业结构及产业空间重新组织等深层次的问题并没有给予重视。

当前,全球服务经营日益网络化、信息化,服务业与制造业呈现融合的态势,政府对服务业进入的管制宽严有度的同时开放程度逐渐提高(段杰、闫小培,2003),这些为区域服务业合作营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国内对区域服务业合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粤港澳(郭海宏等,2009)、闽台(程春生、魏澄荣,2009;林其屏,2007),这些区域有着良好的区位优势和合作基础,而对其他区域的服务业合作研究较

少。区域服务业竞争也同其他竞争一样,是市场经济的内在属性和固有规律及本质特征。竞争能够增强服务经济的活力,是推动服务经济进步的主要因素。服务业竞争力是一个地区服务业的综合竞争能力和发展水平的直接体现,研究区域服务业竞争力对推动区域经济总量的扩张和产业结构调整、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扩大就业等都具有重要意义(赵莹,2005;尚慧丽,2010;夏传文、刘亦文,2010)。

第三节 服务业地域综合体研究进展

服务业地域综合体是指在一定区域范围内以农业和工业为基础,各服务业部门相互依存、相互制约,按一定比例协调发展的有机体,它是以城市为核心形成不同层次各具特色的地域经济单元,是服务业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当前,对服务业地域综合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一、服务业与 CBD 的研究

服务业产业——空间结合的一种形式就是 CBD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CBD 从本质上讲是服务业的集聚之地,是服务业发展的载体,其核心功能的形成发展要靠高级服务业的大量发展与高度集聚。李立勋、买买提江(2011)分析了广州生产服务业发展对 CBD 形成发展的影响,蒋三庚、张杰(2009)总结了我国 CBD 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特点。Ozdemir(2002)研究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发现外国公司的区位偏好一般是在中央商务区(CBD),同时外国投资者的位置偏好为出现的新中心扩展做出了贡献。然而 Coffey 等

(1996)研究发现高级服务业有远离 CBD 向郊区集聚的趋势,主要原因是便于接近市场及客户联系。当然,高级服务业出现离心化趋势并不意味着大都市区 CBD 的衰落,有的是伴随着城市空间结构的调整,更多的则是强化 CBD 专业化和核心化管理功能的需要,这也是高级服务业高度集聚在几个主要的全球城市的原因。目前,国内许多城市都在盲目建设 CBD, CBD 的功能被泛化、弱化,在开发中走样,而 CBD 是城市化水平、经济水平和产业结构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因为 CBD 增长的源泉主要来自全球性商务机构的聚集,只有当一个城市进入到具有越来越大的区域性或全球性的影响力和跨国公司、国际金融机构及相伴而生的各种服务机构大量出现的阶段,这样的城市才会产生建设 CBD 的客观需要。但是,当前对 CBD 建设及成长需要哪些条件以及 CBD 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等这类富有指导意义的研究还鲜有涉及。

二、服务业与区域及城市的研究

伴随着区域与城市的发展,服务业与区域及城市的研究日渐丰富。服务业的发展对区域与城市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其经济发展的影响。Coffey and Polese(1989)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对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作用是不同的,生产性服务业对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较弱。Damesick(1986)探讨了英国劳动力向服务业转移的原因,重点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及区域差距的形成。以上学者都是将服务业就业与区域发展放在一起,分别研究了服务业发展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同时为之后的进一步研究埋下伏笔。Hutton(2003)认为“先进的服务”专业化、中介服务、先进的技术服务及创意服务业在亚

太地区城市发展过程中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服务业就业增长和人力资本形成对城市经济(或出口)基地、柔性生产系统的运作及竞争优势的形成有重要作用。这些城市服务业的发展将需要创新的政策承诺和监管调整,将多中心的、专门的城市服务走廊功能作为区域经济增长的引擎。钟韵(2007)实证分析广州市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历程,探讨其生产性服务业对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影响。二是对其空间结构的影响。Gleave(1997)研究了港口服务业对塑造港口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Gritsai(1997)探讨经济转型背景下商务服务业对首都莫斯科的城市空间重构的影响,利用已有研究成果和商务服务业区位的资料分析,讨论了莫斯科商务服务业的空间结构与世界其他首都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试图解释在一个广阔的历史和政治背景下的商务服务业地理。国内学者王缉宪(2010)研究了港口服务业对城市空间及功能发展演变的影响。闫小培(1999)研究广州信息密集服务业对城市地域结构的影响并揭示了信息密集服务业发展与城市地域运动的关系。

城市群是具有层次性和系统性的高度城市化的区域,同样也是服务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针对城市群的服务业发展,国内学者也做了相关研究,丰富了服务业与区域及城市的研究范畴。袁瑞娟(2009)探讨了长三角服务业一体化的思路和具体措施。彭迪云、李林(2011)探讨了中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分工协作机制。夏传文和刘亦文(2010)、张旺等(2011)分别对长株潭城市群服务业竞争力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特征进行研究。

三、服务业与全球生产网络的研究

全球生产网络是一个包含全球、城市及区域多尺度的空间,它是

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劳动空间分工作用的结果。世界经济自由化程度的加深以及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服务业国际化成为全球产业与市场整合的黏合剂。服务业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核心所在(郑吉昌,2004)。作为沟通全球经济贸易活动和企业跨国生产经营的联系纽带,在构建世界统一市场的进程中,服务业有着传统制造业所无法比拟的特殊功能和重要地位(Johanson and Vahlne,1977)。在构建全球生产网络中起着关键的作用,生产性服务业活动是衡量一个城市在世界网络中位置的重要参照。目前,世界城市的研究由两个基础的论点引导:一是全球城市在不同的地理范畴对公司提供生产性服务,将地方、区域和全国的经济纳入世界经济;二是因为生产性服务业不只是被视为在生产网络中起润滑功能的技术必需,而且意味着构成全球控制的能力,所以全球城市在世界经济的组织中出现了高度集中的命令指向(Parnreiter,2010)。因此,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纵深推进,服务业与全球生产网络的研究将成为学者们关注的另一个焦点。

第四节 服务业发展区域比较研究进展

服务业发展的比较研究主要集中在国际间比较及区域间比较,通过比较研究可以总结一些服务业发展的规律及有意义的启示。Singelman(1978)在对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四国1920~1970年服务业就业的变动趋势研究发现,为生产者服务的部门(包括金融业、房地产、租赁及商务服务业)和社会服务业(政府、教育、医疗卫生及其他非营利性组织)的就业比重上升明显,而其他服务业就业趋势

变动不明显。Gershuny and Miles(1983)对欧共体国家 1963~1978 年服务业内部各行业就业比重变动趋势分析时发现,为生产者服务部门和非市场方式提供的最终服务部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福利、政府服务等)的就业比重迅速上升,其他服务部门的就业比重则下降或者变动不明显。国内学者王泉泉(2007)从产业结构、服务业贸易总量与结构、服务业贸易竞争力指数三方面比较研究了中印两国服务业的竞争力,并借助波特的“钻石体系”理论,对中印两国的要素条件、需求条件、相关支持产业及对外开放等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虽然印度在目前取得了服务业的竞争优势,但是中国在今后的发展中更具潜力。李冠霖、任旺兵(2003)将我国服务业产业结构偏离度的演变轨迹同国际比较,认为我国服务业吸纳就业的空间相对较小,如果没有新的服务需求出现,服务业进一步吸纳就业的能力难以提高。高传胜、李善同(2008)运用投入产出分析表明,中国服务业不仅在服务使用结构及其变化趋势上与美、日、德等经济强国有很大差异,而且在产业的服务投入水平上也存在明显差距。李文秀、胡继明(2008)对我国服务业的集聚程度进行研究并与国际进行比较发现,虽然我国服务业中的绝大部分行业的集聚程度呈上升趋势,但与 OECD 国家相比,我国服务业无论是行业区域集聚程度还是行业内企业集聚程度都远低于发达国家,尤其是行业内企业的集聚程度较低,导致我国服务业的集聚结构较差。

Kirn(1987)比较了美国四大都市区服务业部门的增长和变化,发现考察期内各自服务业的结构呈越来越相似趋势。服务业活动区域分布的变化集中在商业和专业服务业以及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与经济增长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以上对比分析表明,生产性服务业在推动区域就业和经济发展方面作用较为突出,发达国家的服务业